

在突破与赓续中构建“中国化”品格

——散文诗创作刍议

□ 叶松铨

散文诗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像诗歌、散文、小说那样魅力四射,它的受众面一直狭窄,文坛似乎从未对它投注过青睐的目光。我曾想,造成散文诗这种文体遭遇的厄运是什么呢?立于是散文,它是诗的面目;而游弋于诗中,它则是散文的形态。表面看,它兼顾了散文及现代诗的基本元素,俨然具有两栖性。但它不是诗,也不是散文,它的归属意义变得十分尴尬。它虽被排斥在诗和散文之外,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却又常常被诗与散文所羁绊、所裹挟,它站立的态度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洒脱。

也许在某些人的眼里,散文诗是一个怪胎:它被诗排斥,被散文挤兑,它的生长空间十分有限。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事实,或者说都是一种假象。散文诗的双重性,并非是它处境尴尬的原因,双重性恰恰代表了它的特点、它的无限延伸的精神向度、它的超越诱人的品性和气质。散文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早期的很多文学篇章,其实都充盈着浓郁的散文诗的气息,如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刘禹锡的《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前赤壁赋》、周敦颐的《爱莲说》……这些数不胜数、耳熟能详的典籍、篇章里,很多脍炙人口的句子,无一不飘逸着散文诗的风采和风貌。

而散文诗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文体,则肇始于五四时期,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文学家兼诗人的刘半农,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文中提出“增多诗体”的主张,认为:“诗体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之受的束缚愈甚,诗学绝无法达之望。试以英法两国为比较,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自此,“散文诗”这一新型的文学形态,开始在文坛传播,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景观。刘半农关于散文诗的创作,显然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他所言说的散文诗完全是从诗的肌体中剥离出来的,充满着解构主义的味道,这与中国的国情是不相符的,我前面提到中国早期的散文无不蕴含着散文诗的无穷韵味,只是那时还没有文体的分野,更无散文诗之说。但散文诗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的基本雏形已经存在于洋洋大观的散文之中了。

刘半农从西方引进散文诗的创作观念,当时的文化圈曾产生一定的反响,一些文坛大腕积极参与,并身体力行了散文诗的创作实践,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颇有质量的散文诗,如沈尹默的《三弦》、胡适的《看花》、沈兼士的《春意》、刘半农的《静》《雨》,都较好地表现出了散文诗的艺术之美。而其中一个,鲁迅的散文诗成就应该是最高。1927年鲁迅出版散文诗集《野草》,它被中国现代文学史誉为第一部散文诗。“《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生命追问的过程,是穿越绝望的生命行动,它伴随着心理、情感、思想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和转换的过程,鲁迅的诸多精神奥秘蕴于其中。”《野草》的真正的美学价值,除了深蕴其中的思想和哲理外,在艺术表现上,它开拓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散文诗学,它“把散文诗的抒情特点及诗的意韵发挥到了极致。”鲁迅的散文诗所追寻的路径,是中国化的,但又不排斥西方诗学的艺术的、深刻的、警策的语言,在一种整体象征性的深邃语境中,将梦幻般的情感揭示得惟妙惟肖。既秉承中国传统,又大胆汲取西方诗学的有益元素,这就使得《野草》一亮相诗坛,就格调高雅,气质脱俗,以至成为后来者无法超越的经典。

二

从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诞生,中国的散文诗的发展几近百年,但在行进过程中却依然多有羁绊,散文诗在散文与诗的缝隙中摇摆不定,这种文化生态下的尴尬,对散文诗自

在发育和生长,一直缺乏延展的空间。更大的问题是,自鲁迅的《野草》诞生之后,关于散文诗的创作,似乎并未出现令人欣慰的热潮。那种思想性、艺术性均具备极高水平的大师级散文诗诗人再未出现过。从1927年,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问世,散文诗的历史长度几乎与白话诗相当(白话诗起于1920年,以胡适的《尝试集》为时间节点),在这段近百年的“历史长度”中,我们其实清晰地看到,散文诗留下的断点太多、空白太多,鲁迅所开拓出的散文诗的创作路径,没有谁去接力,更何谈发扬光大。我们说,《野草》是散文诗最伟大的存在,但这样的存在毕竟是孤峰耸立,没有与此相对应、相烘托的风景,那么,即或是伟大的存在也让人感到一份孤寂。而与散文诗年龄相差无几的白话诗,自《尝试集》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可谓千帆竞秀、百舸争流,短短的百余年时间,现代诗坛上大师辈出,短短血脉赓续,前拥后推的结果,使得白话诗浪潮迭起,群峰绵延,其景象蔚为壮观。

其实,刘半农早期提出的散文诗观,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的文学门类,他的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即“增多诗体”,这就是说散文诗只是诗的一个分支,它的诗的属性并未改变。由于散文诗没有独立出来,她的文学品格和自身特点便无法凸显,它只是混同于诗中的一个“增多诗体”而已。鲁迅的《野草》,我以为不是对刘半农散文诗观的践行,《野草》的散文化趋向明显突出,按鲁迅自己的说法“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刘半农关于散文诗的创作与鲁迅创作的《野草》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野草》是鲁迅精神苦闷、矛盾和彷徨时的作品,这些短章中,既有厨川白村的影子,又有尼采的影子,还有屠格涅夫的影子,但它所透出的精深的内涵和高贵的气质,无不是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折射,因此,这一组短章,它的出现便带有一种清新脱俗的锐气,同时,它的散文化趋向中又弥漫着浓郁的诗意。文体上,它处在散文与诗之间,但完全划入散文或诗,似不确切,现代文学史将其定名为“近于散文诗”,这虽是一个事实而非的定位,但却有意地在印证刘半农散文诗观的成立。从当代文学发展的视角看,鲁迅的《野草》实实在在地丰富和拓展了刘半农的散文诗观,可以这样说,鲁迅才真正为我们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文体,这种文体虽冠之曰“散文诗”,但他和刘半农提出的散文诗在概念上已有质的区别,刘半农的散文诗观,只是为了“增多诗体”,所谓的散文诗依然是诗的一个类别。鲁迅的散文诗观蕴藏于《野草》中,他以一个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独特构思,践行了散文诗这一新文体的方向:鲁迅为我们精致地呈现了一种散文的品格,即在思想浇灌的文字中,让诗意与情感水乳交融、气血贯通;在栩栩如生的镜像中,精神宛若夏花灿烂,而人们所获取的则是苍苍般的深邃和悠远……这或许才是我们真正所期待的文体——“中国化”的散文诗!

三

我前面曾提到,中国最早的散文中,有类似散文诗的东西,它们大多内植于散文中,并与散文构成有机的整体,而作为相对独立的文体,散文诗一直未能分离出来,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各种文化的暗势力的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各种黑暗势力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一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热潮。

而散文诗这种没有束缚、短小自由的文体恰逢其时,应运而生。然而,文化启蒙的初期,我们对西方艺术观念的态度是一股脑儿地接纳,很少有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合理地消化吸收,表现在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学习上,我们对外国作家,尤其是对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以及苏联作家屠格涅夫、高尔基等文学巨擘,崇拜之情是近乎狂热的,这种狂热的崇拜心态导致不少人藐视传统,抛弃传统,以模仿这些大师的手法和腔调为荣,于是,我们的散文诗自襁褓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外国的印记。

崇尚西方文学,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回望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找到最佳的切入点,单就一个概念,就完全否定一种文体的存在,这绝对是对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犯了中国有无的谬误,一直未有定论。著名散文诗诗人柯蓝是坚定站在中国没有散文诗这一立场上的反对者,“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闭的封建社会,在严格的诗歌规范和思想的束缚之下,不可能突破诗词歌赋和中国散文的新传统,而产生灵魂自由的散文诗这样的新文体的。”话说得确实有点绝对,事实上,中国早期并没有报告文学之一说,第一篇报告文学《包身工》诞生于五四时期,它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然而,这种纪实性的文体,在中国古代的史传作品中其实早已屡见不鲜,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等,可以说开了纪实文学的先河。因此,中国早期没有散文诗这个概念,不代表没有类似的散文诗这种文体形式的存在,我前面已经说到,那种镜像表达的方式,是中国人情释放的特点,但这种释放绝不是肤浅的,它是在一种诗意的缠绕中,映照出情绪的波动,其镜像之美恰恰是诗之美、美人的心灵之美美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构建中国的散文诗学,必须扎根本土,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态度,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写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散文诗。

进入 21 世纪以来,散文诗依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的尴尬处境非但没有解除,相反变得更加模棱两可。倘若没有鲜明的文体意识,散文诗探索将付诸东流。树立文体意识,就是要规范散文诗的写作程式,要厘清散文诗与诗歌、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至少要有个相对明晰的边界,在是与非上不能含糊。对此,我认同柯蓝先生对散文诗的一个基本界定:“散文诗只是诗的情绪,诗的意境,只有诗的魂,却没有诗的外壳。它是诗的散文化。但是,散文诗又不是散文,更不是抒情散文。它比抒情散文更浓缩、更凝聚。”柯蓝表达了双重意思:一是散文诗是没有诗歌形式的“诗”,而诗意的蕴发和揭示,是散文诗的魂魄所系;二是散文诗是被诗化的“散文”,这怎么理解,就是说散文诗吸收了抒情散文的特点,在抒情表现上则更加简省、凝练、传神。

著名文学理论家李标晶认为散文诗除了表象功能外,还有表情功能,对此他认为:“散文诗语言具有表现性、描写性、精确性、多义性和灵活性的品格,因此,它具有词的组合的无限性和修辞手法的丰富性;散文诗的语言与意向的交融、组织同时性;因而意向与情感处于同一动态结构,语言就自然地传达出内在情感的发展过程。”

柯蓝、李标晶均从散文诗的艺术表现的角度对其界定进行了确定,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散文诗自身的独立性的问题,中国的散文诗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行进,我们的路标在哪里?解决了文体意识后,我们该着手解决的恐怕应该是散文诗的“中国化”的问题,如果不坚守这一点,我们所谓的散文诗在美学形式上还是飘忽的,没有自己的内涵和底蕴,我们的散文诗的体系构建,就如同没有基石的楼盘,看似巍峨宏大却底座虚浮。中国完美,同时,对古典传统,在继承和发扬中日臻完美,也是,在古文学中多样化的文体我们也要勇于借鉴和改造,并以此提升和增强散文诗的美学情趣;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沿着鲁迅的《野草》开拓方向,继续扩大我们的视野,紧随时代脚步,关注社会痛痒,歌颂祖国的光明前景;中国化,就是要以开放的辩证的眼光,汲取外国的散文诗的优长,我们要善于从两个方面去学,一是表现形式,二是思想哲理。要在高度领悟中有所发现,有所斩获。

总之,中国的散文诗虽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它潜在的生命力还处在青壮时代,它的勃勃朝气,其实才刚刚被发掘出来,而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的存在,它的力量的积蓄,喷发,将在二十一二世纪文学天空辉煌地显现。我坚信,在《野草》之后,中国散文诗的宏伟蓝图,必将绘就。



“凡人之情,穷则思变。”犹记当年西安铁路局所属西安、宝鸡、安康三个分局中,皆公认安康分局文协最为活跃,搞文学写作、书法绘画、文艺表演的人才最多,皆因安康铁路的生产生活环境最为艰苦使然。其中众多文友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从安康铁路分局越过秦岭,在更广阔天地纵横驰骋,有的已赫然成为国内知名作家、画家、书法家等名士,马士琦先生是其中佼佼者之一。

马士琦如今的文艺“头衔”很多,书法家、作家、资深评论家。而当年我们认识的时候,马士琦还是安康派出所所辖襄渝线紫阳火车站安派分局的民警。小站之艰苦非亲临其境不得其味。援引著名作家杜光辉先生对小站艰苦描述的一段文字,“具体工作是上山维修通信线路。一周六天,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的脚扣、安全带、横担、瓷瓶、工具,攀山,爬电杆,全是偏僻、闭塞、荒凉,但不缺衣食住行,唯缺异性的爱抚和个人问题的需求。过成年男子的正常家庭生活。举目四望,除了山还是山,头顶一溜蓝天,远处的天被阻挡到山外边。女性的容貌、声音和温柔,在记忆里一遍一遍咀嚼,越嚼越香,余味不绝,收获的是更加的焦灼,还有无望的期盼。”士琦在紫阳站派出所,虽不用每天背着几十斤的工具爬电杆,但是翻山越岭过涧爬坡还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正是这种艰苦生活激发了马士琦等一批有志青年,把同事们“打麻将”的时间用来学习和写作,经过多年锤炼,终于修得“正果”。

也许是因环境艰苦和共同的奋斗经历,安康铁路分局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文友相亲”。当士琦开始走上写作之路,写了一些身边的好人好事,在铁路局和地方的报纸上几篇发表出来,博得广泛赞誉。不仅如此,那时我连道士琦曾在《中国青年报》半月之内连发两篇一两千字的头条特写,令人刮目相看。一篇是1980年8月16日二版头条的《座座桥隧连接万里铁道默默劳动保证列车畅通》,写的是两位青年女桥隧工努力奉献,为工区做了许多好事的故事;一篇是同年8月30日二版头条的《养路工人有爱》,写的是勉县工务段三对青年养路工互帮互助,互敬互爱,共同进步,多做贡献的故事。随后均被《分局铁道》报等转载。在初学写作的(分通通讯)中成绩颇大,然而士琦很谦逊,毫无保留地谈他如何学习、如何写作,让我也受益匪浅,直恨相见太晚。

不久,士琦被调到安康铁路公安分处。后来,安康铁路分局党委书记点名

马士琦创办一期配合全路安全宣传月的“职工人身安全教育专辑”(《警笛》报。士琦接受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从约稿、采访和编辑到书写报头,请领导审稿,联系安康日报印刷厂全靠一人完成。一周后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一沓八开四版《警笛》置于书记案头时,书记惊喜地看着士琦十多秒后才看报;头版右上角是士琦行书“警笛”职业工友在“切实加强人身安全 防止职工伤亡事故”通栏标题下,有领导署名文章、有关安全报道两篇及简讯5条;副刊版有典型事例、有评论;四版为副刊。书记放下《警笛》,高兴地说:“内容丰富,版面明确,可读性强!填补了我分局没有报纸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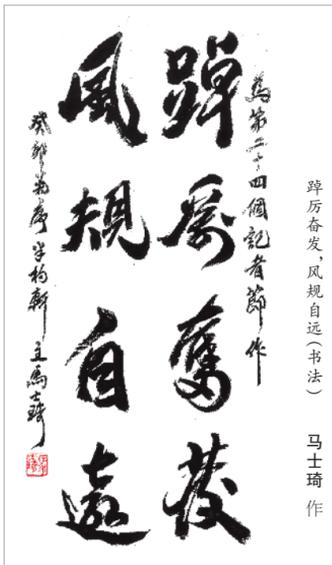
士琦之不多,其艺术特长是书法,如今士琦已是具有高级职称的知名书法家,多次担任全国书法大赛评委。而《安康铁道报》创刊号版就有他的题词墨宝:“豪饮汉江水;高坐巴山云。”他的书法作品数十次在海内外参展并数度获奖,在《中国书画报》《书法报》《解放军报》等数百家报刊发表数千幅。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贾平凹先生分别为其题词:“和墨铸剑独无声”“道德风骨,器识文章”。士琦书法作品被海内外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众多名胜、大单位收藏和刻石。

几十年来士琦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曾多次应邀为军营、学校、铁路、航天等众多省内外事单位赠书书法作品千余幅,为希望工程、赈灾、扶贫、抗灾、帮扶寒门学子等公益事业捐赠、义卖书法作品数百幅,应邀为多所中学的高考考生免费讲解规范书写,应邀为众多师生和深受家长好评。

我与士琦分别已近四十年,当年我俩同为偏远山区业余通讯员,如今士琦已是名人名家,恢复通信后我向士琦求一幅书法,谁知士琦欣然应允。收到士琦墨宝,我大喜过望,随口吟道:“士琦士琦,士中之奇;一日成名,永居奇!”

永远铭记一起并肩的日子

□ 李康平



踔厉奋发,风规自远(书法)

马士琦作

文化纵横

趣说酒事

□ 赵云中

当我穿过安康新城北门这座古老的城门洞,拐进前面这条幽深小巷时,被空气中弥漫的“五里洞”的香甜所醉迷,瞬间勾起酒瘾,引发说酒事的冲动。

我与酒家的接触,大约是在十来岁的时候。不大,缸里叔的不是水,而是酒,好像是柿子酒、甜杆酒或者拐枣酒。我和弟弟二人时不时偷偷地溜进去,揭开缸上的棉盖,用茶缸子伸到缸里舀来喝。开头觉得好辣好呛,呛得我咳个不停,可喝多了也就慢慢适应了,有了“酒量”。

由此破蒙,与酒结缘,步入酒鬼行列。后来饮酒,量虽不大,但很刁,很挑剔,低度的不喝,要在50度以上,52度到65度的最好。当然,稠酒、啤酒、葡萄酒例外。香型也挑剔,挑剔得近乎于狭隘,或谓固执,只喝浓香型和凤香型的,其他的什么酱香型、清香型、米香型、豉香型、馥郁香、特香型等等,统统地不喝,就连中国第一名酒茅台,也不喝,送我也不喝。有一年,外甥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我,很用心地在礼品中带了俩瓶茅台酒,我很高兴。我们聊了许多他童年的趣事,其乐融融。临别时,我说,侄儿,其他的我都留下,就这茅台我不喝,你带回去,别放在这儿被糟践了。他不肯,我急了冒出口实话说,留下,我也许会用它炒菜,做了料酒。他沉了心情,勉强而遗憾地依了我。之后,我想,这做法是不是有点像“买椟还珠”,可笑!幸亏是亲外甥,要放在朋友身上,岂不令人尴尬!

我初识茅台是在一位老朋友家里。我去他家是掌灯时分,他刚吃过晚饭,很遗憾地说,怎不早来,一起喝两盅。说着便命夫人赶紧倒杯酒来。我没带什么酒,从他的表情看,是一种稀罕金贵的酒。接过酒杯看了看,便徐徐地饮了,面部几乎没露出来,但忍不住心地连说,好酒好酒!他这才神秘地告诉我,是茅台。我噢了一声,接说,难怪难怪!

自那以后,我就同名酒闹了“隔阂”。就像粤人习惯了川菜一样,我不习惯于某些名酒,仅仅是个口味偏好问题。名酒究竟什么味儿?我一直形容不清楚,说不出个“子午寅卯”。有次,在一位朋友的宴会上,也有一位不习惯喝国内某款名酒的“伙计”,他脱口说出,某款名酒的味道就像农家新烤的苞谷烧,一股木屑味儿。木屑味儿就是土法烤酒用的木甬子的木头味儿。我一下子被点通了,对,就是木甬子的味儿。头贴切!这一下第二次听到了,对某款名酒的评价。但似乎都是歪评。

对于酒的香型和度数高低的喜好,是“油炒菠菜菜,各取心爱”,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自己喜欢哪个就完哪个。“某款名酒”当然是上等好酒,但无福消受也是白搭。无须为了虚荣,显示身份或富有,刻意向那个“高档”上靠。比如咱陕西的“西

凤”“泸康”“城固特曲”等等,香醇醇,在我,它们堪比“茅台”,堪比“五粮液”……

至于酒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以余之见,琼浆玉液,自然是好东西。它可以给人灵感,激发人的思维灵感,放飞想象力,尤其对于文人,从酒浆中也许会腾地一下冒出惊世之作来,就如李白的斗酒诗千篇一样。也正如杜甫所吟:“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清照“淡酒”一醉,醉出一首千古绝唱《如梦令·误入藕花深处》,传诵至今,无人能及。何由?灵感、酒之灵感也!

酒能让人变得豪爽大气,慷慨无私,解囊助人,毫无保留。“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倾其所有,毫不犹豫,买酒待客,一醉方休。此时若向李白再有所求,他肯定会如子路一般“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酒能激发人的潜能,给人力量。曾经有一位脚夫,为供销社挑运货物,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累了,乏了,饿了。此时恰遇一个路人,便向那人求助一点吃的。那人看了看他的货担,笑了说,你这不挑的有酒吗?那人有酒,就不就有劲了!酒是粮食之精啊!他说,酒是公家的,不能喝。那人又笑了说,你挑到了,把酒钱交了不就对了。他终于被点醒,立马拿出一瓶酒来咚咚咚喝下几口,停了一会儿,果然浑身热乎起来。于是,挑起货担腾腾云驾雾一般飘到了供销社。飘忽中,他信了,酒真能给人以力量。

酒是宽心物,销魂汤,借酒浇愁,一醉解千愁。酒是和气物,借酒洗尘,借酒浇愁,一醉解千愁。酒是和气物,借酒洗尘,借酒浇愁,一醉解千愁。酒是和气物,借酒洗尘,借酒浇愁,一醉解千愁。

酒是喜庆品,但凡欢庆节日,欢庆胜利,欢庆高中,欢庆丰收,婚庆嫁娶,生日寿宴,都需有酒,而且放量畅饮,吆五喝六,欢声笑语,热热闹闹,喜气洋洋。

但,小心,酒也是危险品,坏东西。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丢原则,危失品,坏东西。醉后一端,胡言乱语,丑态百出,断送政治前程;有的打架斗殴,伤人伤己;有的醉驾惹祸,锒铛入狱;有的伤肝伤胃,弄坏身体,后患无穷。

所以,饮酒勿过量,千万别酗酒!做到“好花半开,美酒微醺”。

下笔说酒之前,本人未曾抗拒诱惑,悄悄溜进一家“五里洞酒庄”,就着安康蒸面,美美实实嗨了两大碗,其佳有如“绍兴加饭”,清凉甘冽,很爽很爽。借着酒劲,提笔落墨,记下这段文字,但愿说的不是醉话。



事事如意(中国画)

王瑞琪作